

我和共产党

广州人民广播电台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16779

我和共产党

广州人民广播电台 編
广东人民出版社

我和共产党

广州人民广播电台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州光复路17号)
广东省报纸、期刊、出版社登记证第2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统一书号: T3111·113

开号: 2208·787×1092毫米1.32·3印张·5插页·(1.000字)

1964年3月第1版

196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200 定价: (5) 一角五分

編 者 的 話

为了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一九六三年“七一”、“十一”前后，广州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举办了《我和共产党》、《我和新中国》两次征文。这两次征文，为广州市各阶层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进行回忆对比、忆苦思甜的讲坛，得到广大听众的热烈响应。两次征文，一共收到来稿近一千五百篇。征文的作者，包括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街道居民、教师、学生、机关干部，等等。其中，有九十多岁高龄的老先生，也有年方十岁的小学生。作者所在的地区，除了广州市之外，几乎遍及全省各县、市。

征文通过作者本人解放前后亲身经历的事实，有力地控诉了旧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残酷压榨人民的滔天罪行，热情地歌颂中国共产党、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征文陆续选播以后，在广大听众中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很多听众写信给广播电台，说征文给他们进行了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促使他们忆苦思甜，抚今追昔，因而对旧社会对反动派更加仇恨，对新社会对共产党更加热爱。许多听众还要求将征文稿汇编出版。我们接受听众的要求，从播出的征文中，挑选了较有代表性的二十一篇，另外

再从《南方日报》和其他方面补进四篇，合共二十五篇，編成这本小冊子。

这本小冊子的文章告訴我們：必須牢牢記住劳动人民的血泪仇。

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下的旧社会，劳动人民蒙受的灾难真是沉重到了极点。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剝削，甚至连生存的权利也被剝夺。多少人被逼得卖儿卖女，家散人亡！多少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流亡海外！在这本小冊子里，有的記述自己在旧社会怎样被逼成无家可归的孤儿，有的記述自己在旧社会如何被迫害成残废，有的記述自己在旧社会怎样受到失业、飢餓、疾病、死亡的威胁。他們的苦难，也正是旧中国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所遭受的苦难。

虽然，罪恶的旧社会早已經被推翻了，但是，人們却永远也忘不了昔日的血泪仇。列宁說过：“忘記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不忘过去苦，方知今日甜。永不忘記过去，对于深受阶级压迫、阶级剝削的老一辈的人來說，可以激发他們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增强斗志。对于“在甜水里生，在甜水里长”的年青一代，可以使他們从中懂得什么是阶级压迫，什么是阶级剝削，明白为什么必須革命到底的道理。

这些文章还告訴我們：必須珍惜今天的好日子。

今天，我們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我們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剝削制度已被推翻，反动統治阶级已被打倒。昔日受尽压迫和屈辱的劳动人民，已經成为国家的主人，政治經濟地位起了根本的变化。請看，过去被地主阶级逼得在山洞里住了十二年，解放以后“才感到自己是个

人”的陈少凤，今天“一家人不愁吃、不愁穿”，还当选为街道居民委员会的福利委员。在旧社会生下十二个儿女都死光卖光，丈夫还没断气就被运尸车拉走，最后被逼得盖“狗被”过日子的潘玉，现在当选为省人民代表。曾经受到反动派的歧视、欺压，以至多年的理想成为泡影的技术人员俞乐山，现在当上了广州市重工业局副总工程师。此外，普通的工人念上了大学，昔日的孤儿、乞丐当上了干部……这一切，都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才取得的。

人们想想过去，看看现在，都深深感到今天的好日子得来不易，都在想着应该如何珍惜今天的好日子。因此，这些文章的作者在叙述了他们解放前后不同的遭遇以后，便都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他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在同声歌颂共产党和毛主席给大家带来幸福的同时，都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决心革命到底。

让我们在翻阅这本小册子的时候，也和写这些血泪史、翻身史的人们一道，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望望将来，进一步提高思想觉悟，鼓起更大干劲，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为远大的未来而奋勇前进！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目 录

双喜临门.....	曾 琳(1)
“孤儿”的悲欢.....	朱 杰(4)
生活在新中国太幸福了.....	于凤兰(8)
永远记住党的教导.....	杨 合(12)
我两个孩子的不同命运.....	白佩兰(16)
从“女招待”到服务员.....	梁 霞(19)
没有共产党,我活不到今天.....	黄文若(23)
反动派比毒蛇还凶狠.....	苏松间(28)
公社和我的名字.....	李 光(31)
百载风霜晚年乐.....	曾李黄(34)
水上人家的血泪仇.....	梁润桃(36)
党是我再生的爹娘.....	钟昭文(40)
重见我的父亲.....	伍福旋(44)
为了不忘过去.....	赖 六(48)
侨工两代的遭遇.....	吕祥滢(51)
当我过长江的时候.....	俞乐山(57)

同是出国，两种遭遇	朱德貴 (60)
海关大門的钥匙握在我們手里了.....	許鶴年 (63)
党給我們少数民族带来了幸福	李树庭 (67)
粤剧舞台的春秋.....	李翠芳 (71)
新中国和我的艺术生命	湯由础 (74)
现实的“神話”	庞庆龙 (77)
飲水不忘掘井人.....	余梓勇 (80)
想起盖“狗被”的日子	潘 玉 (84)
山洞里的十二年.....	陈少凤 (87)

双喜临门

广州市越秀区清洁工人 曾 琼

一天，我到工会办退休手續，工会主席亲热地拉住我的手說：“六婆，您在旧社会受了几十年的罪，弄得家散人亡，骨肉分离。现在，女儿和弟弟找到了，退休之后，要注意养好身体。”工会主席告訴我，退休以后可按月領养老金，还可以和在职工人一样享受公費医疗待遇。又說我乐意住在工人宿舍熱鬧熱鬧，就住下去；乐意到龍門女儿家抱抱外孙，組織上也可以送我去。組織上照顧得这么周到，我这个在旧社会被人叫做“垃圾婆”、“扫街婆”的，能不感激嗎？

提起我这一輩子，我深深感謝共产党。

我过去是个貧苦农民。在国民党的反动統治下，我們貧苦人灾难重重。一九四三年大旱，我家四十天沒见过一粒米，丈夫、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一个接一个地餓死了。两个女儿后来也卖給了人家。全家死的死，卖的卖，只剩下我和那十岁的三女儿了。三女儿哭着对我說：“媽，也卖了我吧。卖了我，保住你的命，說不定还能有见面的日子。”就这样，全家八口就只剩下孤苦伶仃的我一个了。后来同村的一个大叔见我走投无路，就介紹我到广州汉民区（现在的越秀区）做清洁工人。

在旧社会做清洁工人，苦处真是一言难尽。我們住的是日晒雨淋的破棚子，一排“长龙”板，男男女女挤在一起。穿的是又髒又臭的破烂衣服，吃的是稀粥烂菜和垃圾堆里拣来的死猫死鼠。我們的工錢，名义上說是每天两斤米，可是发到我們手里，連半斤米也买不到。那些吃人的官僚、把头，层层剝削，层层克扣，还經常拿着我們的工錢去做投机生意，等到物价上涨了，鈔票不值錢了，才扔給我們。那时候，我們每天要劳动十几个钟头，要扫街又要挑垃圾。从一天亮扫到天黑，又餓又累。天晴还好点，碰上下雨，上淋下浸，身上沒有雨衣，脚上沒有雨鞋，想找个避雨的地方都得受气。一九四七年的一个大雨天，我扫完了街，渾身又痠又痛；我靠在一家門口，想喘喘气，避避雨，哪里知道，門里閃出一个气势汹汹的男人，捂着鼻子，朝我破口大罵：“你这个該死的垃圾婆，还不快点給我滾开。”这就是我們清洁工人在旧社会的遭遇！

是共产党給我們清洁工人带来了光明，带来了幸福。解放后，我們斗倒了封建把头，組織了工会，民主选出了自己滿意的领导人。我們有了固定的工資，有了公費医疗和劳保福利待遇。我們再也不住那男女混雜的“长龙”木板了，我們清洁工人有自己的宿舍，有自己的整洁的房間，还有足够的替換衣服。我們的劳动条件也大不一样了。天晴有遮阳帽，下雨有雨衣、雨鞋。一个人負責一个地段，装运垃圾还有专用的垃圾車。一天工作七个钟头。下了班，可以学政治，学文化。大家都亲热地称呼我們工人同志，再也沒有人喊我們“垃圾婆”、“扫街婆”了。有一次，我在清洁街道的时候，

忽然觉得不舒服，身体晃晃荡荡，有一位路过的同志连忙扶住我，给我擦清凉油，还说送我到医院看病。这和我一九四七年那个大雨天的遭遇，是多么鲜明的对比！最叫我感动的是：我们的市长、区长，还有好几个局长，都跟我们一起扫过街，他们说，扫街是光荣的劳动，一个城市没有人扫街，那像什么样儿。他们还說，扫街也是革命工作。的确，在新社会，扫街也和其他工作一样，受到人们的尊重。今年，我当选为全市卫生先进工作者，林西副市长还跟我握手祝贺。这是我们清洁工人过去做梦也梦想不到的啊！

梦想不到的事还有呢，还是双喜临门哩！

去年六月，报纸上发表了有关我的身世的文章，哪里会想到，这篇文章恰巧被我的女婿——龙門县平陵公社神光大队队长吴海新看到了。他看到文章里讲的事，和他妻子过去讲的相似，就连忙告诉妻子，并来信联系。原来，他的妻子就是当年哭着要我卖她的三女儿。今年初，分离了十八年的三女儿和女婿，带着外孙，还有亲家母，都来广州和我团聚。

我和女儿团聚的喜讯，广播电台广播了。想不到，这个喜讯被我的一个失散了三十九年，现在侨居在柬埔寨的胞弟曾錫康听到了。他写信回来打听。起初，当同志们告诉我海外有人给我来信时，我还以为是弄错了姓名。后来念到“曾錫康”三个字的时候，我才猛地记起来，这是三十九年前行乞逃荒，流落外乡的弟弟。我赶忙回了一封信给他，对他说：只有今天新社会，我们姐弟才有互通音信的一天。

（ 華 整理 ）

“孤儿”的悲欢

广州电机厂工人 朱 杰

我是个青年工人，今年二十三岁。

解放前，我曾经是一个孤儿，不，其实我还有母亲、哥哥和姐姐。但黑暗的旧社会，弄得我一家流离失散，确实使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

我的父亲原在翁源县龙仙墟开杂货铺子。我三岁那年，父亲因触怒了当地的伪警察局长，被诬告吸烟聚赌，抓去坐牢。在监狱里，父亲受尽了各种残酷的刑罚。后来，经多方央人求情，才释放回来，可是他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回家几天后就死了。这是国民党反动派欠下我家的一笔血债。当时，正在进行抗日战争，翁源战事频繁。我母亲携儿带女往外逃难，途中因生活所迫，忍痛卖了我那年仅五岁的姐姐。但是，“祸不单行”，在逃难中，我们母子又被冲散了。我和十四岁的哥哥，便跟着另一群人逃命。

一九四七年，我们兄弟俩跟同村的一个堂叔父，流落到广州。我们跟几个同乡一起，搭了一间雨天不能遮漏，冬天不可挡风，每人仅有一个床位的水屋。为了这，还被伪警察敲了“竹杠”。哥哥跟着叔父学会了磨剪刀的手艺，有一餐没一餐地过活，比乞丐好不了多少。那时候的广州，嫖赌饮吹

有如瘟疫般流行，哥哥虽然只有十七八岁，也学会了賭博，叔父更抽上大烟，我們的生活越来越难熬了。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到处拉壮丁，哥哥躲在屋里，一连几天不敢上街做工。可是家里呢，已经好几天没米下锅了。怎么办？跟着哥哥活活地饿死？不得已我只好忍痛离开哥哥，另寻活路。那时我才八岁，离开哥哥又到哪里去呢？我茫无目的地到处流浪，乞讨度日。后来我流落在一艘往来于广州——梧州之间的花尾渡上，船上的工人把我送进孤儿院。

我刚进孤儿院，身上就长满了虱子，跟着又满头满身染上了癣癩。国民党反动派挂着举办慈善事业的招牌，大肆诈骗钱财。那时候的所谓孤儿院，简直就是魔窟。在孤儿院，个个都饿得面黄肌瘦，目光呆滞。要是染上什么病，那就只有活活等死。要是逃跑，给他们抓回来，就要受各种刑罚，如跑沙砾、顶沙盘、托板凳、晒太阳，或者干脆把你关起来，不给你任何东西吃，把你活活折磨死。我熬不过那种比乞丐还要悲惨的生活，便和别的孤儿一起设法逃了出来。

广州解放后，人民政府很快就成立了救济总会广州分会，收容社会上的流浪者。跟着我也被送到儿童教养院。走到教养院门口，我才知道这原来是从前那间孤儿院改名的。我心里很恐惧，以为这回要受刑罚了。但是，出乎我的意料，我们非但没受什么刑罚，院里还组织了一个大会来欢迎我们。院里的一切都变了，全变了！一座座新建的教室、宿舍，还有新开辟的运动场、菜圃、花园，尽摆在眼前。小朋友个个都精神饱满，笑容满面，他们再也不是那样呆板、那样忧郁

的了。第一天，我們就領到了全新的衣服、鞋、帽、蚊帳、棉被和席子。我們還分級分班讀書，課餘有各種文娛活動，就像外面的學校一樣。我們再也不是半飢半飽地喝粥水，而是吃香噴噴的白米飯，還經常有魚有肉吃。病了又有醫生診治。人民政府對孤兒的關懷，真是無微不至了。

兒童教養院像一個幸福的大家庭，老師、同學都像父母、兄弟姐妹一樣相處。我很快就習慣了院里的集體生活。我的流浪生活從此結束了，開始過着幸福的童年生活。我那枯槁的面孔開始紅潤起來，身體也開始胖了。從來沒有拿過書本的我，用五年的時間就讀完了小學，還念上了初中。

在教養院，我常常想念着哥哥。一九五六年，我把想念哥哥的心事向院長說了，院長鼓勵我寫信找尋。信發出后不久，在一個星期日的早上，家裡的人就來找我啦，除了哥哥，還有我幾乎認不出來的母親和姐姐。見到家人，我真是歡喜若狂。對於母親和姐姐，我做夢也未曾夢見過她們，現在居然還能見到面，我激動得話還沒說出口，就先哭了起來，大家也都哭了。原來，母親自從逃難失散后，跟着一些熟悉的人，逃入深山，後來也流落到廣州。一九五三年，在某工地與我哥哥碰上了。我姐姐是在人民政府多方面的協助下，才找到母親的。

不久，我依依不捨地辭別了生活多年的兒童教養院，回到了家。舊社會，把我們弄得家散人亡；新社會，卻讓我們重新團聚。

解放后，哥哥擺脫了有一餐沒一餐的困苦生活，有了安定的工作。他由於工作積極，努力學習，早已在一間工廠當

上了技术員。我那堂叔父，也在一間工厂当上了技术員。我的家，再也不是过去那个雨天不能遮漏、冬天不可挡风的不像样子的家了，破木屋早已改建为砖瓦房，一家人生活得很好。最近，一个朋友从香港回来（他是解放前和我一起从孤儿院逃跑出来，后来流落到香港的），他对我现在的生活，又是惊奇，又是羡慕。我对他說：要不是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我做梦也不会梦见今天这样幸福的日子。

生活在新中国太幸福了

广州铁路局广深线女子第二包乘组列车员 于凤兰

我是广深线女子第二包乘组的列车员。在广州至深圳这条铁路线上，来来往往的大部分是港澳同胞和华侨。有一次，列车已经到站，车厢里一位年迈的老太太怎样也走不动，陪着她的那位年轻妇女，背着小孩，又提着行李，正在发愁。我对她们说：“请个搬运工吧！”那个年轻妇女说：“没钱呀，大姐，这位老太太在香港打了几十年工，没有钱回家，她怕死在外地，好容易才弄到一笔路费回来。”一种阶级的同情感驱使我走上前去，背起老太太下车。又有一次，列车开行了，我问一位香港旅客要不要喝茶，她掏了掏腰包，摇头不要。谁知道我刚一转身，她却跑到厕所旁边的水喉那里，咕咚咕咚地捧着生水喝起来了。原来她很渴，却没有钱。当时我赶快阻止了她，并给她端来了一杯热腾腾的开水。她接过开水激动地说：“你们太好了，在香港，有时候想要一口冷水也要不到。”每当看到这些香港旅客，我总是想起解放以前我们家的苦日子。

我的父亲是个铁路工人，他为人耿直，只懂得埋头干活。可是无论他怎样拼命，我们一家却从没有摆脱饥寒交迫的生活。我还不满十一岁，父母亲就忍痛把我送到工厂当童

工。当时人家看见我那么小，总是不肯收留，母亲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才有一家工厂勉强把我收下来。东北的寒冬腊月，冰似刀来雪似箭。大清早，我穿着一件风一吹就片片飘动的烂衣服，哆嗦着赶去上工。中午，拌着几口冷透心脾的雪，啃那块早上带去的石头似的糠窝窝头作午餐，这已经是母亲给我和父亲特别照顾的了。晚上回到家里，我总是背着母亲，抚摸头上的疙瘩，暗地里偷偷掉眼泪。为了让母亲和弟妹们少吃点野菜，我不得不拼命干活，谁知道被七折八扣之后，每月拿回家的钱总是那么一点点。有一回我再也忍不住了，就一面干活一面嘟囔着：“死干，死干，还不是那么样！”话还未说完，工头给我头上狠狠一棍，我回过头来质问了一句，又是一棍，我被打得头昏眼花，脑子嗡嗡直响。就这样我被开除了，二十多天的工资也被工头吞了。

以后，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父母亲只好忍痛把刚满十岁的妹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又把我嫁给一个和我们一样穷苦的铁路工人。那时候，我还是个不满十五岁的娃娃呢！当时有人愤愤不平地质问我父亲：“你自己穷了一辈子，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女儿往穷窝里送？那个拿着半兜袋金戒指、金链上门求亲的军官你不要，却偏偏要把她嫁给这个穷孩子。”我父亲挺直腰杆响亮地回答说：“什么金链、金戒指，还不是抢来偷来的血泪钱，穷人家饿死也要嫁穷人！”

一九四八年初，父亲几个月拿不到工资，物价又天天高涨，我们家再也见不到一粒粮食了。不满周岁的小弟弟闹起病来，父亲抱着他到处求医，可是谁肯给没钱的穷人看病呢？我们眼巴巴看着他死去。不久，大弟弟也因为吃野菜中